

读《中国小说史略》札记



读《中国小说史略》札记

储大泓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题字：叶圣陶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林伟民

读《中国小说史略》札记

储大泓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南翔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52,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册

书号：10078·3286 定价：0.63元

目 录

代前言：“闲书”不闲	(1)
一 《小说史略》写作与出版前后	(5)
二 一条进行的线索	(32)
三 对小说发展规律的探索	(56)
四 把小说作为历史来读	(84)
五 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主旨	(96)
六 从《水浒传》到侠义小说	(108)
七 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社会意义	(127)
八 打破传统思想的《红楼梦》	(135)
九 清末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	(149)
十 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	(158)
十一 写实、想象和理想	(166)
十二 生活原型和艺术典型	(173)
十三 艺术形象与思想倾向	(183)
十四 刻划人物的性格	(193)
十五 小说的章法结构	(203)

十六 《小说史略》的批判精神和科学态度	(210)
十七 鲁迅后期有关中国小说史的论述	(220)
后 记	(232)

代前言：“闲书”不闲

小说，早在儒家的眼中，是所谓“街谈巷语”，是不登大雅的“小道”。以后，在儒家门徒、封建卫道士的眼中，又是所谓不是“正经书”的“杂书”。而长期以来，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小说又是所谓属于“闲书”，是用来消遣娱乐的。

《红楼梦》里的贾政，是不允许贾宝玉读“杂书”、“闲书”的，只许他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孔孟之书，并且要他把这些书“背熟”。可是贾宝玉对“四书”等“正经书”毫无兴趣，却偏爱看古今小说和《西厢记》、《牡丹亭》等“传奇角本”。贾宝玉看这类书，原是用来消遣娱乐的，但却在思想上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所以成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与这些“闲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贾府的“正人君子”贾政严禁贾宝玉看“闲书”。大观园里的典型的封建淑女薛宝钗也曾一本正经地对林黛玉说：“最怕见了这些个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贾政和薛宝钗从他们的阶级本能出发，从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规范出发，都很懂得“杂书”、“闲书”中有不少异端思想，所以是看不得的。“闲书”不闲，于此可见。

《水浒传》问世以后，封建统治阶级或云“海盗”，加以严禁；或云“忠义”，加以宣扬。封建文人金圣叹既“腰斩”半部，又加大批语；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则长篇考证，不厌其烦。《红楼梦》问世以后的评红文章，真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封建卫道士惊呼为“诲淫”，文人学者纷纷索隐、评论，旧红学、新红学相继风行一时。“闲书”如此，可谓“闲”乎？

鲁迅说得好：“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①。在阶级社会里，有没有供人们消闲的小说呢？有，那就是帮闲文学。有闲阶级“因为饭吃得饱饱的，茶喝得饱饱的，闲起来也实在是苦极的事”，帮闲文学也就应运而生。但正如鲁迅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这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有闲阶级茶余酒后消闲的小说，对他们本阶级来说是歌功颂德、点缀昇平，用来寻欢作乐、消愁解闷；对人民大众来说，则是麻醉剂、腐蚀剂。一句话，仍非“闲书”，而是“工具”。

那么，有没有各个阶级都欣赏的文艺小说呢？有，《红楼梦》、《水浒传》在不同的阶级中都有爱好者，不过欣赏的角度和内容却大不相同；就是同一个阶级的读者，也会有各种不同的眼光，文艺小说本身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复杂性、读者的复杂性，使得对文艺小说的欣赏和评价也异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也更引起人们对文艺小说的兴趣。在各种文艺形式中，最容易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和争议的，也许就是被有些人视为“闲书”的小说了。

^①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393页。

文艺小说的评价和小说的发展，有无规律可寻呢？一定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总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小说，是通过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矛盾冲突、周围环境的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是作家的创作，也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必然要打上时代的、阶级的烙印。文学的历史，包括小说的历史，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发展，而且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读一点小说史，可以了解小说发展的规律，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小说是怎样反映当时各个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了解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渗透、激荡、冲突和演变，我想，这会是很有益的，也会是很有趣味的。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道：“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①他还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②我国的文学遗产是十分丰富的。我国小说有着长期发展的历史。就思想内容言，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华；就创作方法言，有反现实主义、消极浪漫主义等逆流，也有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等优良传统；在艺术构思、表现手法、语言技巧等方面，也有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辩证唯物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701页。

② 同上书，第701页。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读一点小说和小说史，区别小说中的精华和糟粕，了解我国小说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这对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并作为我们今天从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的借鉴，以丰富和提高我们文艺创作的表现力，更好地表现革命的、美好的思想内容，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鲁迅说过：“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①。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小说史略》）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小说史，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在阅读《小说史略》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想法，于是我就陆续写下了一些札记。

^① 《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全集》第6卷第19页。

一 《小说史略》写作与出版前后

鲁迅在《小说史略》的《序言》中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在《小说史略》问世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尽管谈诗说文的著述浩如烟海，但论述小说的篇章却寥若晨星，当然不可能期望有论述我国小说发展史的专门著作，更不可能有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总结小说创作演变的小说史。一九二〇年秋，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开始讲授中国小说史。当时曾用四号字排印了讲义《中国小说史大略》。这以前的油印讲义为十七篇，排印本改为二十六篇，不仅内容充实很多，叙述及文字也有较大的改动。后来鲁迅又在文字上作了若干修改，分上下两卷，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及次年六月由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发行初版本，书名省去一“大”字，定为《中国小说史略》。初版本为二十八篇，以后重版虽有修改，但基本内容与格局均与初版本相同。这是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我国两千年来小说发展历史的专著。它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评介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的小说作家和作品，阐明了小说的源流和演变，“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

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①。这部著作取材详实，分析精当，结构谨严，脉络清晰，内容丰富。它象强劲的东风，清除了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学者在小说研究中散布的迷雾；它象一颗巨星，照亮了我国文学史领域，对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小说史略》写作的时代

《小说史略》写作的年代正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一九一九年，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我国兴起的五四运动，使中国的政治、文化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说，五四运动以后的我国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②在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支革命的文化军队。这支军队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阵地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在“五四”时期新旧思想的激烈搏斗中，鲁迅始终站在最前列，以其深刻的思想、犀利的笔锋，以横扫千军之势，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猛烈冲击。鲁迅高举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两大旗帜，呼啸前进，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③。

①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8卷第313页。以下引此篇只注篇名。

②③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1页。

由于五四运动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运动的参加者,对当时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怀着不同的目的,抱着不同的态度,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在开始时就酝酿着新文学战线内部的分歧和斗争。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内部的分化也日益明显。胡适作为五四运动的右翼,逐步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向帝国主义投靠,向封建主义投降,并且与买办文化、封建文化的势力相勾结,最后堕落为洋奴买办、国民党御用文人。尽管胡适参加五四运动时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宣传科学与民主,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起过一些作用,但当时也已力图争夺新文学革命的领导权,改变新文学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方向,与鲁迅等人产生了原则的分歧。

一九一九年,林纾发表文章鼓吹保古的滥调,遭到了鲁迅等人的有力反击。与此同时,胡适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提出了所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见解,企图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兜售杜威的实验主义。一九二〇年,在文学革命阵地《新青年》的方针问题上展开了争夺战。鲁迅当时清楚地看到《新青年》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看到分裂已不可避免,认为可以分裂,但不能向反动势力缴械投降,因此他在答胡适的信中曾严正表示:“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①在这场斗争中,鲁迅既表明他对共产主义学说和新思想的传布抱着欢迎的态度,也反映了他坚持原则,反对调和折衷的革命坚定性。

^① 《致胡适(1921年1月3日)》,《鲁迅书信集》上卷第30页。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新文学阵营明显分化，正如鲁迅后来在《〈自选集〉自序》中谈到当时情况时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①。新文学阵营分化，封建复古势力也乘机抬头。一九二一年南京东南大学的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创办《学衡》杂志，一九二五年北京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创办“广告性的半官报”《甲寅周刊》，都竭力提倡古文，宣扬封建文化，向新文学阵营反扑。但这些鼓噪已经是复古势力的最后挣扎，在新文学阵营的反击下，没有几个回合，就已纷纷溃散。在这场斗争中，鲁迅是一员主将。他在一九二二年写的《估〈学衡〉》等文以及在这前后写的许多战斗性杂文，是对当时封建复古主义的沉重打击。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工人运动高涨，五四运动中的右翼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阶级本质。胡适在一九一九年宣扬“多研究些问题”时，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整理国故”的活动。一九二三年以后，这种活动更为加紧。他以“学者”的面貌出现，纠集右翼文人创办《国学季刊》，叫嚷“古学要沦亡了”、“古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因此要开展“国故运动”。当时反动统治者也在各地大办国学馆，极力诱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去钻故纸堆。鲁迅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议上的演讲《未有天才之前》，对所谓“整理国故”，给以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批判：“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落魄的来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348页。

讲国故了，……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①鲁迅对胡适之流整理国故运动的批判是十分有力的。

胡适之流鼓吹整理国故，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有政治色彩的。胡适曾公然宣称，要使青年们知道，“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他打着整理国故的旗号，兜售杜威的实用主义，以自然主义的文艺观、烦琐的考证方法、“索引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来阉割我国古典文学的现实内容，并竭力宣扬民族虚无主义，说什么“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还说“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者害了我们”，要“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②。这种论调实际上迎合了当时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需要。尽管胡适对旧传统思想的批判有其功绩，他的考证工作也有某些发现，但谬误亦多，特别是他的唯心主义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影响甚广。在革命日益深入的形势下，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终于走上与封建文化、买办阶级文化同流合污的道路。

鲁迅在同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右翼的顽强战斗中，充分运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276页。

②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胡适文存》三集卷一。

用了杂文这个锐利的武器，同时也在文艺理论和文学史领域里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踏实的工作。在文化问题上，他既反对复古倒退，反对崇古贬今，也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否定一切。他对我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现实的需要，是为进步的文学事业服务的。鲁迅的《小说史略》是当时新文学革命运动的产物，是他用新的文艺观、史学观占领我国古典文学阵地的杰出成果，是当时新文学运动的重大成就。毛泽东同志说过：“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①在这方面，鲁迅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贡献之一就是他的《小说史略》。

《小说史略》出版前的我国小说研究

《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部小说史。为什么我国的小说史研究领域长期荒芜？且不说唐代的“特绝之作”传奇文和宋代兴起于市井间的话本“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就是从元末明初的长篇小说算起，至清末也有五百多年了。如果从魏晋小说算起，至《小说史略》问世，那就有近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了。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出现专门研究我国小说发展的小说史呢？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一贯鄙视、压制小说。《汉书·艺文志》中所录诸子十家，但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只能附在诸子的末尾，因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汉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9页。

书》还引经据典，以孔子的话作证：“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①意思是说，这种小技艺会妨碍远大的事业，所以“君子”是不屑去搞它的。孔氏门徒对这句经典式的贬词，不仅在以后的《隋书·经籍志》中照搬不误，而且遗毒绵延不绝。鲁迅在《小说史略》中对儒家和封建文人的歧视小说及其造成的影响，有过深刻的分析。鲁迅指出：“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夥，而史志皆不录。”受儒家学说和传统思想影响的“史志”，对于数量很大的盛行于民间的小说，是看不入眼的。后来有的书目中虽然也收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因为明代有都察院刻本，“世人视若官书，故得见收，后之书目，寻即不载”；还有的书目虽然也收录了，但也并不是对文艺有什么真知灼见，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因为“专事收藏，偏重版本，缘为旧刊，始以入录，非于艺文有真知，遂离叛于曩例也。”传统观念长期束缚了人们的头脑，蒙蔽了不少人的眼光。“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由此可见儒家观点流毒之深。小说既被视为“小道”、“闲书”，谁还会去认真研究，为之树碑立史呢？可是，尽管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学者歧视小说，但也不得不承认，“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小说的存在和发展自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源和它自己的发展规律，这是不以封建统治者和孔孟之徒的意志为转移的。

明、清时代的有些封建文人，从他们的立场、观点出发，已经看到小说的社会作用并予以重视。金圣叹评点小说，胡适

^① 见《论语·子张篇》。按原话是子夏所说。

对此大为赞赏，在《水浒传考证》一文中竭力吹捧说：“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狠不可多得。”胡适的这一吹捧完全是少见多怪。实际上，明代末年，李卓吾、袁宏道、冯梦龙等人已对小说进行鼓吹，以提高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就曾指出金圣叹“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①。

清末民初，我国的学者对小说的社会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天津创刊的《国闻报》上，刊登了严复与夏曾佑所写的《本馆附印说部缘启》，长万余言，以资产阶级观点阐明了小说的价值，认为“说部”兴起，“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把中国封建文人素来轻视的小说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特别是在改良主义运动失败之后，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康、梁之流很注意借助小说来继续推行改良主义，并与革命潮流相对抗。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感到“颇欲移挽恨无术”，很有些灰心丧气。他看到当时小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遂惊呼“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他认为小说为雅俗所共赏，是“衿纓市井皆快睹，上达下达真妙音”，因此，这位举人希望菽园居士丘垅蓑“妙笔写生”，赶快写出关于政变的小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403页。